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二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初唐山西诗坛

王青峰 王国棉 著



初唐山西诗坛成就斐然,影响巨大,贡献辉煌,为初唐诗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王绩、王勃、宋之问是唐诗中最高的一根枝条,是唐诗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著代表,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促成了初唐山西诗坛的繁荣。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2辑)

初唐山西诗坛

王青峰 王国棉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12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434-52-6

G·88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	-----

一、初唐时期的诗坛风气与初唐山西

诗坛的发展概况	(1)
---------------	-----

二、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先驱——王绩

.....	(6)
-------	-----

(一)有才无功的一生	(6)
------------------	-----

(二)王绩的诗作	(12)
----------------	------

(三)王绩诗歌的艺术特色	(19)
--------------------	------

三、初唐四杰之冠——王勃

.....	(22)
-------	------

(一)才高寿短的一生	(22)
------------------	------

(二)王勃的诗文	(28)
----------------	------

(三)王勃对初唐诗坛的历史贡献	(37)
-----------------------	------

四、律诗定型化的楷模——宋之问

..... (39)

(一) 几经谪宦的一生 (39)

(二) 宋之问的诗文 (42)

(三) 宋之问的文学成就和历史贡献

..... (52)

五、山西诗坛在初唐诗歌发展史

上的历史贡献与地位 (55)

(8)

(8)

(9)

(9)

(22)

(22)

(28)

(78)

引 子

要准确把握初唐诗歌的发展状况，必须抓住两条线索：一是诗风的革新，主要是与齐梁浮靡绮艳诗风的斗争；二是诗体的建设，主要包括律诗格律的定型化。要准确把握初唐山西诗坛及其在初唐诗歌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作用和地位必须抓住三位山西籍诗人：王绩、王勃、宋之问，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促成了初唐山西诗坛的繁荣。

一、初唐时期的诗坛风气与 初唐山西诗坛的发展概况

明、清以来，诗评家多沿用明初高棅在《唐诗品汇》中对唐诗的划分，高棅把唐诗的演进过程大致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当然，这也只是相对笼统的分法。根据现、当代对唐诗的研究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初唐的时间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总计92年，此外，盛唐60年，中唐65年，晚唐72年。

总的说来，无论是从诗人的数量来看，还是从诗作的数量来分析，初唐诗坛的主流都应 是宫廷诗，初唐实际上是一个宫廷诗的时代，尽管初唐诗歌的精华却是王绩、“四杰”、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人的诗作。初唐宫廷诗的盛行

与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推崇密切相关。唐太宗在登基前身边就聚集了大量的文学之士,《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载:“于时(武德四年,621年)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这里的十八学士实质上就是宫廷文学创作群体。高宗、武后以及中宗朝的宫廷仍以文馆为中心,集中了大量的文学才俊,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珠英学士集团”和“景龙学士集团”。这里的“珠英学士集团”和“景龙学士集团”其实质都是以宫廷文馆为活动场所的文学沙龙。《唐会要》卷三十六详细记载了包括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徐彦伯等二十六名珠英学士的姓名。《新唐书·李适传》也详细载述了景龙文馆学士集团的盛况:“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李)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义、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由此可以反映出初唐文学创作队伍的繁荣。文学之士云集宫廷的盛况正如后来杜甫《赠蜀僧闾邱师兄》诗描述的那样:“在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冠儒,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

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给广大中下层诗人崛起于诗坛提供了机会,特别是“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完善强烈地诱发着士人

对诗赋的兴趣，激发了全社会对文士的尊重，对文学的爱好，从而客观上极大地刺激和造就了全社会读诗、写诗的风气，造就了文人开展文学活动的宽松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却使得宫廷诗歌在更加繁荣的表面下越发浮艳淫靡，直至陷入严重的危机和衰退。原因在于，宫廷文人为求得或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多以诗谄媚皇帝，依附权臣，歌功颂德、点缀升平，所以诗人虽多，诗会虽盛，诗的内容却多是寡淡无聊，感情贫乏，生活面狭窄，诗人们也就只有把精力用在词藻、对偶、声律、典故等诗歌形式技巧的追求上，借以炫耀才华、取悦皇帝。正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指出：“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这正是对当时宫廷诗歌日益严重的浮艳纤巧倾向的尖锐针砭。

当然，还应看到宫廷诗人及其诗作的历史进步意义和贡献：宫廷应制诗的盛行客观上促进了律诗的成熟和繁荣。包括文馆学士们于宫廷外的私宴文会赋诗，如“安德山池宴集赋诗”、“于志宁宅宴群公赋诗”、“高正臣林亭晦日置酒”等在内的初唐的应制诗，比起魏晋、六朝的来，不仅词藻华丽，音韵铿锵，而且体制庄严恢宏，对仗精密，极大地促进了格律诗的写作水平。正如黄子云在《野鸿诗的》中说：“应制诗不徒避忌讳、取工丽而已也；体裁题义，不可不讲。魏、晋以还，作者未能悉中规矩，至初唐法律始谨严。另外，宫廷学士们给后世还留下了一些相关的类书，如：武德七年（624），欧阳询等编写的《艺文类聚》一百卷，高士廉等编写的《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显庆二年（657）许敬宗等编写的《文馆词

林》一千卷，显庆三年(658)许敬宗、上官仪、董思恭等编写的《瑶山玉彩》五百卷，龙朔元年(661)许敬宗等编写的《累璧》六百三十卷，大足元年(701)张昌宗等编写的《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此外，还有孟利贞等编写的《玉藻琼林》一百卷，上官仪等编写的《芳林要览》，元兢等编写的《古今诗人秀句》二卷等等。这些工具书都为初唐的诗学建设和诗歌技巧的探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为唐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初唐的92年又可分为三个时期，学术界一般笼统地概况为三个三十年。第一个时期为唐王朝建立后的头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坛普遍弥漫着“梁陈宫掖之风”，宫廷成为绝对的文学中心，宫廷诗的创作队伍与创作数量占据着绝对优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山西诗坛，王绩异军突起，一枝独秀，开启了唐代山水田园诗歌的先河，诗风质朴平易，清新简淡，呈现出与齐梁绮艳诗风迥异的创作风格，在创作实践上为形成新的诗风作出了很大努力。第二个时期为高宗及武后执政前期共约三十年。这一时期宫廷仍然文士云集，君臣之间的酬唱应和频繁。在山西诗坛涌现出杰出的“神童”诗人王勃，年少才高的王勃作为“初唐四杰”之冠跻身诗坛，对当时依然盛行的宫廷绮艳诗风痛加批判，提出诗文应有“刚健”的“骨气”，在创作实践中努力使诗歌表达的题材、内容由宫廷台阁拓展到江山塞漠，从而体现出思想开阔、风格雄健、感情充沛的新气象，明显具有诗风革新的风貌，对于扫除、廓清影响力依然巨大的齐、梁余绪功不可抹。在第三个三十年间，宫廷诗歌创作步入了新的高潮，武后与中宗曾多次举行御前赛诗，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格律诗的成熟与完善。在山西诗坛，宋之问卓然出众，致力于初唐诗体的建设上，从诗歌艺术形式的探求与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最终完成了律诗的定型。

■ 总体来看，初唐山西诗坛的诗创作比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宫廷诗坛进一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基本继承了“诗言志”的风雅传统，风格质朴劲健，感情真挚激越，同时也比较充分地汲取了六朝诗歌创作在艺术上的成就，并加以创新，进一步使律诗定型，从而全面地、理性地端正了诗歌创作的发展方向，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充分的准备。如王绩的诗内容质朴而声律严谨，王勃之诗感情真挚而遣词缜密富丽，宋之间则大量用格律诗的形式创作情真调苦的贬谪诗。与之相比，风骨与声律兼重的盛唐正是对初唐山西诗坛这一方向的深化和升华。如盛唐在题材上沿着这一方向进一步扩展，无一例不可入诗，国家命运、边塞征战、民生疾苦、田园山水、音乐舞蹈等等皆可入诗，在描写对象上士、农、工、商、兵、宫人等等皆可讴歌，此外，在艺术技巧上也更具有创造力，在风格上更多地体现出盛世涵孕的雄浑、豪迈、奔放、刚健、明朗。由此可见，初唐山西诗坛从根本上克服了初唐宫廷文学不能直面广阔社会现实，生活内容空乏单调的通病，从而扭转了诗歌创作主体贵族化与风格单一化的倾向，推动了诗歌创作从作者、题材、风格等的泛化和下移，也使齐梁诗风从内容、格调等方面得以纠偏校正，体现出高度自觉的创新意识，同时又不失理性地对齐梁时期诗歌格律方面的成就予以大胆的吸收、消化、再创新，进而推进了律诗的最后定型，极大地丰富了唐诗的表现艺术。

初唐山西诗坛相对繁荣。在全唐诗中有记载的山西诗人有王绩、薛收、王硅、朱仲晦、王勃、王勔、薛元超、宗楚克、狄仁杰、宋之问、员半千、薛曜、薛稷等数十位。山西作为李唐政权的发祥地，有着极高政治地位，太原被定为北都，蒲州（今永济市）被定为中都。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是联系东西二京（长安、洛阳）的必经之地，再加上隋唐之际民间私立教育的发展，如隋末大儒王通在晋南河津市兴办私学，培养了大量的文化人才。这些都有利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也直接推动了初唐时期山西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初唐山西诗坛的繁荣决不是偶然的。

二、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先驱——王绩

（一）有才无功的一生

王绩（约589—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属山西万荣县通化镇）人。有《东皋子集》（一作《王无功集》）传世，今存诗五十余首。

王绩出身于北朝士族家庭，其祖父王—曾被周武帝加封为安康献公。王绩和他的兄长王度（著有《古镜记》）、王通（隋末大儒）、王凝一样从小就受到极其正统的儒学教育。所以，王绩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非凡的文化才能。据史书记载，他在七、八岁时就能读《春秋左氏传》。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十五岁的王绩去长安游历，谒见权臣杨素。王绩引经据典，高谈阔论，纵论时势，语惊四座，被誉为“神仙童子”。

超人的才华再加上历代簪缨的家庭出身，时时激发出他胸怀儒家兼济天下的抱负。不难想象，王绩少年时有着锐意进取，希图建功立业的胸怀。在他晚年的作品《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少年时对前途的幻想与希望：“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蠕频北上，怀刺几西游。”

王绩的政治经历可粗线条地勾勒为三仕三隐。

第一次出仕是在隋炀帝大业十年(614)，王绩年约二十多岁时，参加了“孝悌廉洁”科的考试并得以通过，被授予秘书省正字的官职。因他不愿在朝为此闲职，请任外职，于是，随即他便被改授扬州六合县丞。在六合县被冠以“性简傲，耽于饮酒，有妨政务”的罪名，屡遭弹劾。加之，当时已是隋炀帝后期，天下开始大乱，自叹曰：“网罗高悬，去将安所？”于是将所受俸金积放于县衙门之外，轻舟夜遁，返回家乡。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在漫游河北时王绩参加了窦建德的起义队伍，希望能建立出将入相的功业，但是，随着窦建德起义的迅速失败他的理想也随之破灭，数月后回到龙门老家。

第二次出仕是在唐武德五年(622)，三十多岁的王绩被李唐政权征召，但只不过是待诏门下省，数年未授实职。待诏门下省的待遇是每日供美酒三升。他的弟弟王静当时为唐高祖禁卫，问他：“待诏可乐否？”他说只有三升美酒值得留恋。主管门下省的江国公陈叔达把他的俸酒增至一斗，故当时人称他为“斗酒学士”。约于贞观三年(629)，因兄检校御史王凝弹劾侯君集，牵连到太尉长孙无忌，得罪了长孙太

尉，王绩受株连，以疾罢归。

第三次出仕是在贞观十一年(637)，王绩又参加了铨选。但是仍然不被重用。于是，他看中了太乐署的府史焦革善酿酒，求作太乐丞。据吕才《王无功文集·序》载，当时选司以非士职，不授，王绩说：“士庶清浊，天下所知，不闻庄周羞居漆园，老聃耻在柱下也。”卒授之。不料焦革数月便死去，焦妻袁氏起初还经常给他送酒，后来袁氏又死了，王绩叹曰：“天乃不令我饱美酒！”遂挂冠归。约于贞观十三年(639)，王绩结庐(龙门)河渚，纵意琴酒，葛巾驱牛，躬耕东皋，彻底退隐，直至贞观十八年(644)谢世。

总体来看，王绩思想中杂有儒家追求与道家信仰，而且随着生活磨难的不断打击使得后者对他的人生哲学影响越来越深，三次出仕的失败经历更加催涌着其思想的发展、转变：少年时执着进取的理想抱负逐渐发展至放任纵酒、崇奉老庄、宣扬酒德、随分自适的消极态度。

初出茅庐而又才高万丈、豪情满怀的王绩志向无疑是要跻身台辅，行治平之大道。但是，家门的不幸遭遇首先给他以打击和动摇。他的三兄王通儒学名于当世而不见用，仁寿三年(603)曾诣阙献《太平十二策》，隋文帝虽盛赞之而未采用。此后，王通便教授与河汾间，魏征、薛收(薛道衡之子)等唐初名臣都出于其门下。王通政治上的失意，直接消解着王绩执着的儒家理想，影响和导致了王绩人生观、价值观的复杂化。其次，王通、王度的英年早逝也对王绩以很大打击。王通卒于大业十年(614)，约32岁，当时王绩在六合县丞任；王度卒于武德元年(618)，约38岁。在此种噩耗的

打击下，王绩便只有借酒消忧，用酒精来麻醉痛苦的神经。在六合县因“性简傲，耽于饮酒，有妨政务”的罪名屡遭弹劾也更易于让后人理解。此外，他也不时以书面的形式表达满腹的愤激、牢骚。在《解六合丞还》一诗中说：“我家沧海白云边，还将别业对林泉。不用功名喧一世，直取烟霞送百年。彭泽有田唯种黍，步兵从宦岂论钱。但使百年相续醉，何辞夜夜瓮间眠。”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自叙后期“吾自揆审矣，必不能自致台辅，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汉，何用方舟？不思云霄，何用羽翮？故倾以来，都复散弃，虽周孔制述，未尝复窥，何况百家悠悠哉”！从这些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王绩的思想及其前后的巨大变化。

王绩学识渊博，除儒学外他对老庄的道家学说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极深的造诣。他说：“床头素书三帙，《老》、《庄》及《易》而已，过此以往，罕尝或披。”足见他对老、庄之学的尊崇。王绩自字“无功”，典故出于《庄子·逍遥游》“神人无功”。三兄王通不赞成，说“字，朋友之职也；‘神人无功’非尔所宜也”。又如他写的《五斗先生传》否定天下有“仁义厚薄”，又说“生何为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王通不同意他的看法，指责道：“汝忘天下乎？纵心败矩，吾不与也”。从“昏昏默默”，“无功于时”的主张中，足见老庄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此外，王绩还工于道家的占卜之术，吕才《王无功文集·序》说：“君既妙占算，兼长射覆，（武德六年623）尝过仆射裴寂，覆鸛鵒鸟，请君筮之。”

王绩崇奉老庄思想，但并不陷于虚妄的神仙迷信，在晚

年所写的回忆录性质的《游北山赋》中嘲笑那些希图升仙的人说：“昔怪燕昭与汉武帝，今识图仙之有由。人谁不愿，直是难求。闻鼎湖而欲信，怪桥山之遽修。玉台金阙，大海水之中流；琼林碧树，昆仑山之上头。不得轻飞如石燕，终是徒劳乘土牛。”指出那些痴心妄想的人们去海外仙山或昆仑山上寻找玉台金阙，正像石燕不会轻飞，土牛不会行走，完全是徒劳的。

正是基于如此复杂的遭遇、痛苦的经历和矛盾的思想，王绩才会有放任、随便、消极乃至逃避的举止。隋末在六合作县丞、唐初待诏御前及做太乐丞，去就随便，最后，“养拙辞官，含和保真”，皆因志不获展。李唐王朝建立时他说：“乱极治至。王途渐亨，天灾不行，年谷丰熟。贤人充其朝，农夫满于野。吾徒江海之士，击壤鼓腹，输太平之税耳。帝何力于我哉！”从中可见，对久乱之后的太平治世，王绩是称颂的，但他只希望作一个下钩、挥锄的南亩之民。他在《被征谢病》一诗中写道：“汉朝征隐士，唐年访逸人。……颜回惟乐道，原宪岂伤贫。借草邀新友，班荆接故人。市门逢卖药，山圃值肩薪。相将共无事，何事犯嚣尘！”他满意自己的山野生活，不愿人来聒吵。还有，隐归龙门后，以书拒绝泰州（后改为蒲州）刺史杜之松召见，他在《答刺史杜之松书》中说：“意疏体放，性有由焉。兼弃俗遗名，与日已久。”自然，王绩的放达自适，并非真的完全由于对隐逸生活和田园风光的热爱，更多地是出于怀才不遇的块垒和遁辞。

王绩的隐居生活并不是十分惬意的，孤独、空虚、缺少知音的痛苦可以说时时体现在他的诗文之中。特别是第三

次出仕失败后，他常常“以酒德游于乡里，往往卖卜，时时看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据，乡人未有达其意也。”王绩对无望的后半生表现出极度放任的人生态度。表面上，王绩在纵酒时大力宣扬酒德。深入分析，纵酒其实是对心理郁闷的宣泄，对人生理想破灭、价值追求落空的哭诉。吕才在《王无功文集·序》中说：“晚年醉饮无节，……或乘牛驾车，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动经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好事者寻寻讽咏，并传于代。”如《题酒店壁》、《醉后口号》、《题卜铺壁》、《题酒店楼壁绝句八首》、《醉乡记》、《独酌》等诸多赞美饮酒的诗文。另外，他还撰写了《酒诰》、《酒谱》二卷，并为杜康立庙致祭。他认为“眷兹酒德，可以全身”，认为饮酒之君，“既无忤于物，而有乐于身，故常纵心以自适也”。“纵心自适”是他追求的生活境界。他还向程道士说：“足下欲使吾适人之适，而吾欲自适其适。”为此，王绩有时从儒、道、释三家的教义中寻找符合自己思想的理论，使三教统一于他“纵心自适”的观点之中。在《答程道士书》中他曾说：“昔孔子曰：‘无可无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谓之玄’而乘关西出；释迦曰：‘色即是空’，而建诸法。此皆圣人通方之玄致，宏济之秘藏。实冀冲鉴君子相期于事外，岂可言行诘之哉！故仲尼曰：‘善人之道践迹’；老子曰‘夫无为者无不为也’；释迦曰‘三灾弥纶，行业湛然’。……故各宁其分，则何异而通？苟违其适，则何为而不阂？故失圣人者非他也，顺适无阂之名，即分皆通之谓。”

贞观十八年(644)，五十三岁的正绩临终自克死日，遗命薄葬，兼预自为墓志。在自作的墓志文中他说：“起家以禄

仕，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全唐文》卷六一八载陆质（淳）在《删东皋子集·序》中赞王绩说：“等是非，遗物我，方之外者也。……庄叟之后，绵历千祀，几于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与物冥，德不外荡，随变而适，即分而安。忘所居而迹不害教，遗其累而道不绝俗。故有陶公之去职，言不怨时；有阮氏之放情，行不忤物。旷哉渊乎，真可谓乐天之君子者矣！生于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遗文高迹不显。余每览其集，想见其人，恨不同时，得为忘形之友。故祛彼有为之词，全其悬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无愧异代之知音尔。”足见王绩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二）王绩的诗作

作为志不获展、隐逸山野的文人，自然风光、田园生活最易于成为其借以吟咏情性的物质媒介，也最易于进入文人笔下用以抒情言志。王绩曾说：“诗者，志之所之；赋者，诗之流也。”“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所以，在他看来，无论诗、赋都应言志为本。故王绩的诗大都是抒情言志之作。有时描绘自然山水奇特、美好的景象，有时抒发隐逸生活的闲适，还有时以诗的形式抒写他对哲理的领会。凡此种种，他都能以幽居者的细腻感悟和笔触来描摹、再现身边的山容水态；又以田园中悠然自得的主人公，歌唱田园生活带给他的欢乐与自由。

从文学史的宏观脉络来看，王绩上承陶（渊明）、谢（灵运），下启王（维）、孟（浩然）。具体来看，王绩的诗主要涉及四类题材：山水、田园、饮酒、哲理（玄言）或咏史。